

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

语言研究的跨文化视野

Studying Language and Its Use : An Intercultural Approach

许力生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研究的跨文化视野/许力生著.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

ISBN7-5446-0024-6

I. 语... II. 许... III. 文化语言学 - 高等学校 - 教材
IV. H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0904 号

《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编委会

主任：胡文仲（北京外国语大学）
贾玉新（哈尔滨工业大学）

副主任：Bates Hoffer（美国三一大学）
Nobuyki Honna（日本青山大学）
Steve Kulich（上海外国语大学）
陈凌（香港浸会大学）
高一虹（北京大学）

委员

Andy Kirkpatrick（澳大利亚科廷大学）
Michael Prosser（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Richard Wiseman（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福勒顿分校）
Robert N. St. Clair（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
陈国明（美国罗得岛大学）
顾嘉祖（南京师范大学）
罗选民（清华大学）
秦明利（哈尔滨工业大学）
申惠中（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许力生（浙江大学）
张惠晶（美国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
庄智象（上海外国语大学）

总序

跨文化交际学是一门在传播学等学科理论的基础上,与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化学以及社会学等相互交叉而发展起来的学科。其实,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古已有之,但是真正将文化交流进行理论研究进而发展成“跨文化交际学”,还只是近四五十年间的事情。想要深入探究这门学科,我们首先要了解它的起源。

20世纪60年代是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高度发展的年代。随着科技的进步,空间距离大大缩短,各种文化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但是空间距离的缩小并不意味着人们之间的文化距离或是心理距离可以瞬间缩短。与之相反的是,人们不能再用旧有的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来理解和解释日新月异的世界里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同时,文化差异滋生众多的交际失误、矛盾和冲突,反而使人们的心理距离加大。矛盾和冲突的背后不仅仅是利益或者领土的争夺,也不仅仅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歧,而更多的是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巨大隔阂——正是这些隔阂使“地球村”中的人们虽然身在“咫尺”之间,却有如隔天涯之感。

美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种族的国家自然而然成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兴起之地,其中以美国人类学家 Edward T. Hall 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跨文化交际的理论,现在学界也一致将他的著作 *The Silent Language* (Anchor Books, 1959) 当作是这一学科的奠基之作。

到了 20 世纪 70、80 年代,学者们把研究重点逐渐从对比和分析不同文化交际中的差异(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转到研究跨文化交际动态多变的过程(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中去。以此为基点,William B. Gudykunst 等一批学者建构了动态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理论的突破带来了学科快速发展,跨文化交际研究所涉及的学科越来越多,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研究方法日益科学。学科的发展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空前广泛的关注,跨文化交际学被引进大学课堂,相关的研究学会和专业学刊相继出现,各种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定期举行。现在只要在网上简单查询一下相关书目,我们就会发现此类专著多达几百种,在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更是不胜枚举。William B. Gudykunst 曾在其著作 *Cross-cultur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age Publications, 2003) 一书中总结了 15 种不同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理论研究和探索上的巨大进步标志着跨文化交际学的学科发展日臻成熟。

进入新世纪,“地球村”每个角落的每个公民都不同程度地被卷入了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浪潮。同时,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全球化不等于一元化。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年代中,个人之间、社会全体之间、民族之间乃至国家之

间,无不存在着文化差异甚至文化沟壑。培养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缩短文化距离,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已经成为新时代的迫切需求。由此,我们不难预见到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在 21 世纪被逐步推向高潮。

在关注国际学科发展趋势的同时,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虽然我国历史上早有注重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社会研究的传统,但是现代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在我国的起步还要追溯至上世纪的 80 年代。当时随着国内学界对于语言学和文化研究的不断重视,在“文化热”和“反思热”的影响下,语言研究人文化成为新的热点,这无疑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扩大了国际间的学术交往,外语界的学者和教师成为国内首先接触到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一批人,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这一学科的研究主力。我们可以这么说:上世纪 80 年代是跨文化交际学诞生、成长和发展的关键十年。一方面,海外归来的学者把西方有关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方法和教学实践介绍和引进到中国;另一方面,国内研究者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多方位、多角度地探索和开发我国跨文化交际的学科外延,开创了初步繁荣的研究局面。

外语教师和对外汉语教师是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领域的主力军。他们在教学的过程中认识到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应当成为外语教育的重要内容,外语教学必须与文化相结合。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国内一部分外语院校首先推出了跨文化交际学课程。时至今日,我国已有几十所大学的外语院系开设了这门课程。

1995 年,首届中国跨文化交际国际研讨会在哈尔滨

召开,来自世界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几百名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与探讨。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也在这次会议中正式成立——这标志着跨文化交际研究在中国迎来了一个新纪元。自学会成立以来,已定期组织了 6 次国际研讨会。同时有些院校也多次组织大型研讨会,广泛开展国内不同地区间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跨文化交际研究得到了空前迅速的发展。

广大教师、语言学者们兼收并蓄,著书立说,撰写论文,编写教材。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出版的专著和教材多达几十本,发表的论文也有 2000 篇以上。他们研究和探讨的内容丰富多样,涵盖范围广泛;有些学者和教师的研究更是对西方学者的某些理论提出质疑,提出了自己的视角独特的观点。

IV 由于学科性质所决定,跨文化交际研究比其他学科更需要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实际上,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已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部分,并为推动跨文化交际研究在世界范围上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们的研究会中有不少教师学者同时也是国际学会会员,他们或在国际学会组织和国际学刊中承担重要工作,或是经常受邀参加在海外举行的学术会议,在会上交流论文。不少论文受到国际学界的好评,并在国际学刊上发表。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学者也在国外出版他们的专著,传播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回顾这 20 余年的学科发展,我们也应清楚地意识到前进路上存在着的诸多问题。首先,在理论研究方面,正如王宗炎先生所指出的“收集采购之功多,提炼转化之功少”,我们还没有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理论。Wil-

liam B. Gudykunst 教授也曾指出亚洲学者需要创建适合自己文化的交际理论。只有学习和借鉴而没有发展和改造,没有结合自己文化特点的理论,是不可能把跨文化交际研究建成一门适合中国国情的学科的。其次由于理论指导不足,我们的研究多集中在文化对比方面,对动态多变的交际过程的研究和探讨不够,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尚需要更多的探索和拓展,这些都影响了我们在这一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在新的世纪,我们需要进一步开阔视野,发展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推动此领域的学科建设,加强此领域的教学和教材建设,以满足广大教师、研究生以及各方面读者的需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于推动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考虑,决定推出“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丛书既引进国外权威力作,也出版我国学者的著述,还有中外专家的合力之作。我国读者可以通过这套丛书学习和借鉴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的真知灼见,在领略我国学者和专家的新思维和新成果的同时,还可以欣赏各种文化交流的结晶。我们相信“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对于今后我国跨文化交际学的发展将会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们代表丛书编委会对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表示诚挚的谢意。

胡文仲
北京外国语大学
贾玉新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06年4月

目 录

引 言	i
第一章 语境问题的跨文化分析	1
1.1 语言机器中的“幽灵”	1
1.2 语境研究回溯	4
1.3 语境与文化的综观.....	12
1.4 拓展的语境观述评.....	23
1.5 语境与语言功能.....	32
1.6 语境研究的问题与趋向.....	41
第二章 语用研究的跨文化审视	49
2.1 语用研究中的文化缺位.....	50
2.2 语用即文化.....	53
2.3 语用规约上的文化差异.....	57
2.4 合作原则的文化局限性.....	66
2.5 言语行为的文化多样性.....	71
2.6 礼貌的文化相对性.....	89
第三章 话语风格的跨文化考察	101
3.1 来自边缘对中心的冲击	101

3.2	性别话语研究的发端	105
3.3	话语风格上的性别差异	109
3.4	对话语风格差异的不同解释	119
3.5	性别话语研究的意义与问题	124
3.6	话语系统与话语社团	132
第四章 语篇的跨文化对比与翻译		141
4.1	卡普兰假设与语篇对比	141
4.2	关于直线还是螺旋的验证	145
4.3	过度概括与先入为主的倾向	154
4.4	来自语境的挑战	166
4.5	语篇翻译与文化关系的新视角	175
4.6	从新的视角思考翻译问题	185
第五章 交际能力的跨文化探索		194
5.1	从语言能力到交际能力	195
5.2	交际能力观的扩展与变化	200
5.3	交际能力的文化特殊性	204
5.4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构成	210
5.5	语用失误问题与跨文化交际	224
5.6	外语教学中的文化与交际能力问题	230
结语		251
参考文献		255

引 言

我们人类常常被称为是“会说话的动物”，“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春秋穀梁传·僖公二十二年》）。正是语言的运用使我们脱离了其他动物，成为了独特的人类。如恩格斯所说，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创造了人类。

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提出过“语言乃存在之家”的著名命题，语言是人的生存世界，是人之所在。所以，海德格尔也认为，人归根结底就是言说者，是语言使人成其为人。另一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也说过“我的语言的边界就是我的世界的边界”。换句话说，语言的范围有多大，人的世界就有多大。控制论的创立者维纳（Norbert Wiener）则指出，人对语言的兴趣是人的所有兴趣中最近乎人所独有的，语言是人的最大兴趣，也是人最突出的成就。

这些论述都意在说明语言在人类世界所占有的中心地位，语言是人类赖以相互交往和理解的最基本的，也是最为复杂的手段。正因为如此，对语言的研究也成了人类最有意义和最具挑战性的探索之一。研究和认识语言，就是研究和认识人类自己。

1. 百年回首

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十世纪似乎可以被称为“语言学世纪”。世纪之初由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所发起的语言研究的根本性变革,使现代语言学得以建立。

自索绪尔起,现代语言学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在这一个世纪中,语言学蓬勃发展,成就巨大,同时还极大地影响了一些相关学科。正因为如此,曾有不少人认为,无论就其理论结构而言,还是就其任务之确切性而言,现代语言学都是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中特别先进而且对其他各学科有着重大作用和影响的带头学科。

作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理论思想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二十世纪语言学发展的方向。他所区分的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语言的内部(*internal*)与语言的外部(*external*)、共时语言研究(*synchronic study*)与历时语言研究(*diachronic study*)、能指(*signifiant*)与所指(*signifie*)、组合关系(*syntagmatic*)与聚合关系(*paradigmatic*),以及语言是“关系”(*relations*)而非“实体”(*substance*)的集合、语言符号的任意性(*arbitrariness*)等概念,一直被认为是现代语言学最基本的原理。

索绪尔做这样一些区分是有他的目的的,那就是要设法使语言学成为一门“纯粹”的科学。因此,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学要研究的是“语言”,而不是“言语”,共时语言研究比历时语言研究更为重要,研究语言内部的语言学才是真正的语言学。语言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其研究对象就只能是排除语言与外部联系之后的语言本身的结构系统。

在索绪尔设计的架构内,研究语言可以不涉及言语,而且常常是不能考虑言语的状况,因为只有这样,语言才有可能得到称得上是清晰、明了、系统、纯正的科学描写,也才有可能得到据说是足够

充分的解释。索绪尔一心只关注所谓语言内部,坚持把语言当作一个由其内部各部分相互关系所决定的自足系统,当作独立于其使用和使用者的抽象系统,并认为只有这样研究语言才是“科学的”语言研究,才是“真正的”语言学。这样一来,研究的范围步步收缩,研究者的目光最后都聚焦在他所说的语言系统上。

在他的那本著名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结尾,他给后来者留下了“就语言研究语言、为语言研究语言”的遗训。据说在现存的索绪尔当年写下的教案中和他学生的笔记中都找不到这段话,看样子是《教程》的编辑后来加上去的。有人认为,这是他们对索绪尔思想的完美概括(见屠友祥,2002:29)。不管怎么说,这些思想对以后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语言学从此走上了一条追求其学科独立自主的道路。

为了与其他学科“划清界限”,为了维护其独立学科的合法性,也为了在自然科学占统治地位的大学、研究所等学术机构中争得一席之地,从那时起,语言学研究就刻意地将语言与语言使用者分离;将语言与言语的联系切断;将语言的共时状态与其历史割裂开来;将对语言内部结构的研究与结合社会文化环境的语言研究对立起来。

不能不承认,这样的做法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必要的,它激励语言学家脱离传统语言研究局限于经典考据或某些具体语言及语言现象的羁绊,从整体上去把握和认识语言,到纷乱复杂的语言现象背后去寻找系统的一般规律。同时,这样做也是有成效的:看看现代语言学百年来的发展和成就,看看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尤其是英美等国)大学里的独立的语言学系,这是索绪尔在世的那个年代难以想像的,也许算得上是实现了索绪尔的梦想。

但是,如有的学者所指出(Thibault, 1997:113-130),索绪尔坚持区分语言和言语是出于理论建构的需要,而并非要把二者完全割裂开来。其实,在索绪尔的《教程》中,并不像后来人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只有一个声音,而是可能包含着多重声音。索绪尔自己

始终承认，语言和言语是紧密相连而且互为前提的。

然而，在后来相当长的时期里，索绪尔的这些划分被绝对化了，语言学研究关注的只是这一系列二元对立中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几乎完全被排除在语言学家的研究视野之外，排除在“科学的语言研究”范畴之外。本来是人安身立命之所在的语言，在研究中被层层剥离，剥得个精光，只剩下一个孤立的、自足的语言系统，人（语言使用者）连影子也见不到了，更不要说人的世界、人所赖以生存的社会与文化。

后来，到了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等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手里，言语似乎并不那么受排斥了，但语言学的视野却没有变得更开阔，因为他们认为言语太纷乱复杂，让人很难观察到语言的全貌，语言学的任务只是要发展出一套如何从言语中发现语言形式结构的科学程序以及描写形式结构的方法。

iv 索绪尔跟乔姆斯基(Chomsky)有许多不同，但是索绪尔的这种思路在乔姆斯基那里被发挥到了极致。乔姆斯基也有他著名的二分：语言能力(competence)与语言行为(performance)。和索绪尔只关注语言而不理睬言语一样，乔姆斯基也只讨论语言能力，而把语言行为排除在其研究范围之外。与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有所不同的是，在乔姆斯基那里，我们似乎还可以隐隐约约看到人的影子，语言是人的语言，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性标志。但是，这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是“理想化的人”，是“抽象的、与世隔绝的人”(Hymes, 1972)。如乔姆斯基(Chomsky, 1965:3)自己所说：

语言学理论所要关心的是一个理想化的说话人兼听话人，他所在的社团的言语是纯之又纯的，他对这一社团的语言的了解是熟之又熟的，他在把语言知识施之于实际运用时，不受记忆力限制的影响，也不受注意力分散、兴趣转移以及(偶然的或惯常的)语言错误等情况的影响，因为这种情况是和语法无关的。

乔姆斯基认为人类语言是一个“生物客体”，语言知识是人的官能，是区别人与其他动物的本质生物属性，人类生来就具有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即语言的初始状态。这种由人类遗传基因规定的状态受到后天环境中语言的触发刺激，发展成一种稳定的状态，获得具体语言的知识，从而形成运用语言的能力。因此，应当使用与自然科学相同的方法来研究语言。他所开创的生成语法就是试图使用典型的、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人类语言的生物学属性。因此，他十分强调“理想化”(idealization)在语言研究中的科学意义，认为“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者”才是语言学理论要关注的。

按照这样的观点，语言学要研究的是内化在人脑中的语法，用乔姆斯基的话说，是“内化语言”(I-language)，而不是社会的、集体的“外在语言”(E-language)。内化语言不是无限多句子的集合，而是能够生成并且只能生成无限多合乎语法句子的能力。在乔姆斯基的理论中，外在语言不过是内化语言的派生物。虽然研究内化语言的证据来自外在语言，但外在语言自身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科学研究实体，乔姆斯基认为，只有研究内在性语言(语言能力)，我们才能抓住语言的本质。

乔姆斯基这样做自然有他的道理。为了达到理论上的彻底性，为了追求超越纯粹描写的理论解释力，他不得不把研究范围限定在所谓“语言的最中心部分”(Hymes, 1972: 273)，将一切其他因素都排除在外，以使其研究对象尽可能地单纯。

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由乔姆斯基所创建的生成语法学成了语言学研究中的主流。由于他们是在一个比结构主义更为抽象的层次上研究语言，根本不考虑语言的社会性，不考虑具体语境中的语言运用，使得语言学更加远离尘世，远离芸芸众生的现实世界，把语言学研究的人文传统完全抛弃，努力向自然科学、向数学靠拢(在乔姆斯基看来，语言知识差不多就是一个抽象的运算系统)。

对于语言学这样的发展走向，人们不是没有过疑问。实际上，

有语言学家很早就开始感到不安了。萨丕尔(Sapir)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曾指出,语言学完美整齐的条条框框只不过是对于千变万化、丰富多样的社会文化行为的某种概括,不能因此而忽视语言本身存在的多样性和变异(Sapir, 1929)。他(1921: 219)认为,“语言的内容与文化紧密相关”,“语言是人们习得的文化功能”,而不是人“生来就有的生理功能”(1921: 3)。

后来,海姆斯(Hymes)针对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观而提出了“交际能力”观,强调人是社会人,语言是人的社会交往行为。甘柏兹(Gumperz)则注重对动态的言语交互过程(会话过程)进行研究,主张把语言放置在大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考察,认为那种脱离社会文化现实的语言研究即使不是误导也是十分片面的。他们都认为,人在用语言进行交际时所需要的远远不只是“语法”,而是多方面的知识。即使是语言使用是否合乎语法的问题,也不能脱离语境、脱离语言运用的社会文化环境来讨论。此外,比合乎语法更重要的问题是语言使用是否符合社会文化规范。

vi 韩礼德(Halliday)也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套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明确反对把语言学研究局限于“语言”,认为也应该研究“言语”,而且要投入更多精力去研究。韩礼德强调语言的社会性,在他看来,二十世纪的语言学犯了一个错误(不知是该归咎于索绪尔还是索绪尔思想的诠释者),并被这错误长期困扰,那就是沉溺于语言系统而置言语于不顾,以为实际使用的言语除了用于给系统提供证据外别无用处(Halliday, 1994: xxii)。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不仅说话,而且是相互交谈”(People not only speak, but speak to each other)(Halliday, 1978: 57)。因此,他主张语言学家要研究真实生活中人们相互交往时实际使用的语言,而不是所谓理想化的人所知道的理想的语言结构。语言不是独立自足的,语言和语境中的种种因素关系密切。语言学家要做的不是人为地割断其联系,而是指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并进行梳理与说明。

回首这将近一个世纪的语言学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看出,索绪

尔所创建的现代语言学理论主要是从语言本身去描写和解释语言。虽然这基本上是二十世纪语言学的主流,但仍然有为数不少的语言学家认为,语言现象要以语言之外的因素来说明和解释。奈达(E. A. Nida)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说的话也许还值得我们思考:“脱离实际语言的语言学多半是人为的;不经常考虑语言所表达的人际意义,语言学常常只不过是真正的语言学的一个影子。”(转引自祝畹瑾,1985:34)。

2. 独立的代价

从某种意义上说,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是语言学的“独立宣言”,使语言学得以摆脱长期依附于思维、文化、历史、文学等研究的从属地位。

然而,这样做也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语言与使用语言的人被彻底分离了,语言与语言赖以存在的社会文化环境也彻底分离了,语言被视为一个自立和自足的静态系统。不知道索绪尔有没有意识到,他所认为的语言内部机制的任何运行与变化实际上都很难独立于语言之外社会大系统的运行与变化。索绪尔把言语“流放”到了语言学的“边疆”,即使还没有完全否认其存在及意义,但至少是使其始终居于边缘与次要的地位,对言语的研究往往也被视为不够科学,至少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科学。在这个崇尚科学犹如从前崇拜上帝的时代,可想而知这样做会使言语研究处于什么样的境地。

长期以来,现代语言学自觉地穿上索绪尔所定制的“紧身衣”,有意识地将语言研究与语言所植根其中的社会文化相分离,通过限定所谓合法的语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来排除或尽量缩小语言涉及的社会文化方面,以维护其学科的“纯洁性”与“科学性”。凡是试图将社会文化方面,包括其中的语言研究都会被指责为“缺乏足够的科学性”、“不严谨”或者“不客观”、“理论阐述力太弱”等等,